

一、導論

過去研究已經指出，1980年代過後，健康與疾病知識愈來愈不再為醫療專業人員所壟斷，常民能夠透過各種傳播媒介取得相關資訊，成為日常生活中醫療決策、照護實作以及建立疾病認同的重要資源(Clarke et al. 2003)。甚至，我們在當代社會中對許多疾病、藥物與治療介入的經驗，首先（且經常主要）都是透過它們在新聞或其他媒體形式中的再現(Briggs 2011)。藉由這些媒介經驗，人們得以建構或修正關於健康、疾病與病痛的概念，並成為解決日常生活中各種相關問題的認知資源(Seale 2004)。因此，大眾傳播媒體如何表徵醫學、健康與疾病，就關係到當代醫學知識生產與傳布、醫療支配形式演變、生病經驗的社會形塑等重要研究主題，值得進一步予以分析。特別是在爭議疾病的案例當中，新聞媒體對於疾病成因與治療選項的報導，以及對相關批評與異議的呈現方式，都可能影響民眾對於問題的定義，導向相應的行動決策，甚至形塑公共政策與治理。

兒童時期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（Attention Deficit/Hyperactivity Disorder, ADHD，以下簡稱過動症），或許正是現代精神醫學史上最具有爭議的疾病之一，也一直是醫療社會學者用來論證「醫療化」(medicalization)的經典案例(Conrad 2006)。在此，醫療化的概念意指過去不以醫療觀點來認識的行為（如酗酒）、情緒（如害羞）或是生理過程（如更年期），後來卻被定義為醫療病況，從而能使用醫療的方式來加以處理。雖然醫療專業本身始終掌握定義疾病的權力，但醫療化最好還是被視為一個集體合作的事業，尤其是晚近包括生物科技與製藥產業、病患與消費者，以及由第三方管理的醫療給付制度興起，都成為推動醫療化的新驅動力，甚至超過醫療專業本身(Conrad 2005)。而大眾媒體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也成為不少研究極欲梳理的主題（如 Boero 2007;

Clarke and Everest 2006; Coveney, Nerlich, and Martin 2009; McAllister 2012; Tiefer 1994)。

本研究目的是追溯兒童過動症在台灣新聞媒體中的建構及其轉變，以揭示出新聞媒體與醫療之間的獨特關係，並豐富我們對於過動症在本地脈絡中如何被醫療化的理解。根據臨床醫師的觀察，過動症至少從2004年起就占據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門診中最高的求診比例（顏正芳2004）；大眾媒體也經常出現相關報導與資訊，使得這個診斷類別早已深入台灣民眾的日常知識庫，成為最爲人所熟知的兒童期精神疾患之一。特別是2010年1月，報紙披露新北市某安親班教師爲了「讓小孩上課集中注意力」，餵食學生過動症藥物「利他能」(Ritalin)事件（孟祥傑、張祐齊2010），甚至以「兒童古柯鹼」與「餵毒」來指稱利他能與安親班教師的不當行爲（詹建富、陳惠惠、薛荷玉2010）。這樣的新聞再現不但引發輿論譁然，也導致當年度健保資料庫申報的過動症藥物開給量劇減(Wang et al. 2016)。由此可證，新聞媒體確實可能實質介入疾病的議程設定(agenda-setting)與管理實作(Seale 2003)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倘若這種疾病的本質及治療在科學醫學上仍未達到充分共識，我們更有必要去探究它在媒體上究竟如何被呈現，以及呈現方式轉變背後的可能機制。因此，本研究考察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建構兒童過動症，包括：病因、特質與處置策略如何被呈現？不同專業被賦予何種角色？什麼樣的解釋模式最具支配地位？有什麼樣的歷時變化趨勢？是否存在相互競爭的觀點？又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後果？

二、過動症爭議、媒體與醫療化

作爲當代最引發爭議的兒童期精神疾病，過動症的主要症狀表現爲不專心、太過好動與衝動，且嚴重性已減損其學習與社交生活的品質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)。由於這種「症狀」看似普遍存在